



【热点论坛】

华侨华人投资对上海经济转型的作用

陈志强

(上海商学院 社科部, 中国 上海 201400)

摘要: 本文分析了海外华裔的经济特点、发展趋势及上海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阐述了华侨华人对上海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所起的先导、示范、联动和扩散作用, 提出利用上海区位优势, 立足浙闽粤等侨乡资源, 发展非政府组织, 建立模块服务团队, 形成以港澳台为节点、以东盟为跳板辐射美加澳的产业互动群, 构筑筹资、营销和创新三大板块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华侨华人, 经济转型, 作用

中图分类号: D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37-324X(2012)-01-68-75-08

2010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全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 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力度, 探索实行技术移民, 制定国外智力资源供给、发现评价、市场准入、使用激励、绩效评估、引智成果共享等办法。”^[1]

上述政策的出台表明,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高端人才紧缺问题日益突出。而在高端紧缺人才队伍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侨华人, 他们大多选择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作为创业之地。以上海为例, 截至2008年, 上海留学归国人员中, “有90%具有博士、硕士学历, 70%来自发达国家, 30%有在海外大公司中高层管理岗位的工作经历。在上海163名两院院士中, 有86人具有侨的身份或海外留学经历; 而在上海高校现职领导中, 具有侨的身份或海外留学经历者已占8%。”^[2]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6月20日会见第四届世界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时, 对华侨华人寄予厚望, 希望他们能够“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 做中国统一大业的积极促进者, 做中华文明的积极传播者, 做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积极推动者。”^[3]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既令人振奋, 又发人深思。上海的人文环境、法制环境和投资环境的现状能够

给华侨华人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呢? 华侨华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 与地方政府的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很大关系, 最终要看归国人员是否移得进、留得住、住得久、能融入, 也要看上海经济转型能否与华侨华人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实现有效对接。本文拟从华侨华人的投资结构及其演变、上海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华侨华人在上海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一、华侨华人的投资结构及其演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外资进入中国呈同步上升趋势。中国引进外资取得了巨大成效, 海外华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目前, 中国的海外华侨华人遍布于世界近170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资金2万多亿美元, 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不仅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新兴产业的不断兴起, 世界产业链的梯度分配、地缘布局和行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海外华侨华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在所难免, 而如何借海外华侨华人的产业转型和变化之机推动上海产业结构升级, 促进上海经济转型, 是当前侨务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大陆投资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9至1991年为第一阶段, 是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

收稿日期: 2012-01-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年上海侨务理论研究课题“华侨华人对促进上海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最终成果(课题编号: N0. 2011-6-1)。

作者简介: 陈志强, 河北定州人, 博士, 上海商学院社科部主任,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欧美政治经济与外交, 国际移民问题。电子信箱: chenzq6@sina.com。

投资的初步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速度较慢,且规模也较小,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企业。当时海外华资主要投向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金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如纺织品加工、电子电器组装等“三来一补”企业占据大部分比重,投资期限多为三至五年,投资方式以合资、合作为主,投资额和规模都不大。这些企业在税收上享受“免三减四”的特别优惠,这对于吸引大量海外侨胞,到国内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在华投资总额超过 180 多亿美元,华侨华人的投资区域由经济特区扩大到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沿海地区,并逐步延伸到广大内陆地区,投资期限延长至十年以上;投资方式由合资、合作向独资发展,投资领域由一般的组装、加工业向深度加工业和系列加工业转变。

1992 至 1997 年为第二阶段,为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快速发展时期。19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生产型企业项目如工业、农牧渔业、交通、能源、邮电等生产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要求不断提高投资质量和技术水平。1992 年中国政府做出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利用外资的领域逐渐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旅游等第三产业。这一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在华投资总额超过 1 677 亿美元,平均每年达 200 多亿美元。

1998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为海外华侨华人在祖国大陆投资的调整与成熟发展时期。中国政府逐渐将引资重点转向高新科技领域和引导外资投入国内薄弱产业部门如基础产业的建设。引进外资的重点已不仅是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是要配合产业调整和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门类。

(二) 华侨华人对华投资结构

导致华侨华人投资大陆的影响因子有三:一是政策,如近年来我国对外商税收优惠和引资重点转移后,逐渐转为与中国公民同等待遇后,便对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外资项目和单纯为享受优惠政策而对华投资的项目有所影响;二是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三是我国与国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形成的推拉力量。从目前华侨华人对华投资结构的状况来看,正在形成由东南亚向欧美扩散、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和多元化的态势。

首先,华侨华人投资的来源地分布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已经形成了以东南亚地区为主的态势。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5 年年底,我国累计吸收的 6 224 亿美元外商投资中,至少有多达 4 170 亿美元是由华侨华人主导的企业带来的,约占全部外商投资的 67%。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5 万多家,其中华侨华人企业约占 70% [4]。虽然目前华侨华人的投资

来源地仍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但随着美、加、澳等国对新移民吸引力的增强以及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政策的制定,新移民对华投资趋势开始显现。

其次,华侨华人对华投资的行业正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表现在:(1)虽然东南亚华侨华人财富仍主要来自传统行业,但高科技含量在增加。房地产、农业、银行与金融、食品与饮料是东南亚华人富豪的主要财富来源,以这些传统行业为核心的东南亚富豪合计占入选福布斯富豪榜总数的 60.48%。但与过去不同是,IT、电子、环保、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已开始成为东南亚华人富豪的重要财富来源,以这些为核心业务和从事多元化业务的富豪占总数的近 10%。(2)北美华侨华人则以贸易型和科技型为主要特点,投资领域集中于信息产业,外贸和生物制药,“海鸥型跨洋经营的华人企业增多。”[5]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2008 年度全球华商高科技 500 强排行榜统计,港台、美国和东南亚入选的 200 家华商高科技企业中,从事电子信息产业的有 187 家,占总数的 93.5%,这说明电子信息产业正成为华侨华人投资的重要行业。

(三) 华侨华人海外投资结构的分析

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和对外经贸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商业移民和投资新移民到世界各地从事贸易相关的批发、加工、零售等业务,使餐饮、旅游、金融、地产等传统行业重获生机,并改变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区域分布和行业发展态势。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馆、贸易批发和商业零售已不限于服务华人社区,而是扩大到华人社区以外并以非华人社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移民和国内游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旅游、租赁和金融服务业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1. 餐饮业。海外中餐馆经营地域不断扩大,资本来源逐渐出现了一批现代化经营的连锁企业。2009 年美国约有 4.5 万家中餐馆,年销售额 200 亿美元,加拿大仅多伦多和温哥华 2007 年就有约 2 000 家。欧洲仅英、法、德、西、荷、奥六国 2007 年就有中餐馆 3 万多家。

2. 酒店业。在美国,据估计仅南加州 2007 年华侨华人开设的旅馆已逾 400 家,2009 年专门从事大陆游客服务的旅游机构超过 100 家。

3. 贸易、批发与零售业。在中国大陆居民和中小企业出国经商的热浪中,海外华商的贸易、批发与零售业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成为联系中外贸易不可缺少的重要中介和推销中国商品的至关重要的营销网络。中国中东沿海地区的出国商人特别是温州商人,已成为推销中国小商品的重要力量。

在美国,200 家温州籍批发商集聚于纽约曼哈顿小商品批发市场,在此工作的温州人逾千人。来自港台的北美新移民也通过与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和利用新移民

带来的机会获得成长和转型。2009 年,巴西的温州商人有 5000 多人。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南美最大的小商品贸易集散中心有 700 余家华人商店,主要经销中国商品。在阿根廷,华人超市 2006 年市场占有率已达 7%。在中东门户阿联酋的迪拜,有 2000 多家温州、义乌、福建等地销售五金皮具等小商品的贸易商。在俄罗斯约 100 多万外国人中有 90% 以上是华人,他们从事批发和零售各种中国商品。

4. 房地产与金融业。华人新移民为北美华人房地产与金融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增加,房地产业成为加拿大华侨华人经济增长最快,投资额最大的行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加拿大华人房地产公司发展到了 500 家。美国华裔创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等将近 2000 家,其中,华资银行有 80 多家。

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科技和金融环境下,海外华裔凭借其灵活机动和善于应变的特质,正在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例如,东南亚和北美传统华裔聚集区开始利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有利时机,加大布局投资中国的力度;非洲正在成为吸引华裔新的聚集地,非洲华裔加快向多元化和本土化发展,从主要从事工程承包、商贸、餐馆业等发展为在当地投资办厂。

(四) 华侨华人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影响因素

当前,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和利用外资水平的提高,侨商境内投资将呈现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形式更多样的发展趋势。华侨华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方式表现为:一是职业多样化、行业多元化、领域扩大化和技术含量高新化。从外部来看,推动海外华侨华人经济转型的条件有三个:一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现代企业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二是华侨华人有过成功进行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经历和经验,为其新的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发展与祖国大陆形成相互需求和相互呼应的态势。

从内部来看,影响华侨华人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有:

- (1) 华侨华人数目剧增;
- (2) 海外侨胞的资本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 (3) 海外侨群的变化使经济管理和科技人才不断出现。海外侨胞中有 200 多万优秀的经济管理和科技人才集中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保障;
- (4) 华侨华人经济科技社团日益增多,为投资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 (5) 华人在所在国参政意识日益增强,一旦他们参政议政获得成功,将为对华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 (6) 华侨华人的传统产业已经出现危机;
- (7) 海外侨胞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当中,也意识到要在中国继

续投资发展,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8) 中国与侨民居住国经济关系的变化产生的推力和拉力。

二、上海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十二五”规划的战略高度来看,上海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一是出口拉动模式需要转型。上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依靠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导致上海经济的外向度较高。2008—2009 年,上海的出口平均依存度是 74%,而从 2003 年到 2008 年,全国出口的平均依存度为 34%,上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但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其出口依存度分别是 7%、24%和 10%,由此形成了欧美消费。亚洲生产。中东地区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的全球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欧美贸易赤字和东亚贸易盈余的基础上,其经济增长不是产业技术革命、产业创新带动的结果。与这种模式并行不悖的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愈演愈烈,表现在传统的贸易壁垒不断扩大,而新的贸易壁垒又层出不穷。2009 年,世界已经有近 60 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超过 100 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且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还有 130 项。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经济转型面临来自国内外双重压力,只有充分利用上海现有的技术和产业优势,面向亚非拉国家推进产业转移,同时以“四个中心”建设为核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吸纳海内外物流、资金流和人才流,才能有效规避发达国家发起的贸易摩擦,同时打造以上海为上游的国际产业链。

二是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更加突出,外延式投资拉动模式需要转型。上海持续十六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大开放、大投资、大基建带来的总量扩张。2008 年,上海的投资是 4800 多亿,2009 年,上海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是 5300 亿左右,投资强度是 1 平方公里 1 亿元投资。这在一般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没有的,这种投资规模不可能再有大的增长,特别是世博会之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随着上海进入后工业化、后世博时代,这种高速度外延式的投资趋动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上海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新增用地即将用完,城区开发的强度过高,能源资源的供求偏紧,能源的价格长期高企的情况下,难度更大。

三是上海的产业水平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组装加工型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上海通过大开放、大合资实现了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型,但是与国际大都市及深圳等国内先进城市来比,上海的产业能级,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组装经济的痕迹明显。首先,服务业发展基础不牢,结构层次偏低。从总量来看,2009 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是 8847 亿,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落后于北京和广州。北京服务业的比重达到

76%，广州服务业的比重是 61%。上海的服务更落后于纽约和伦敦，后两者的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的 80%。目前，上海服务业主要集中于商贸餐饮等传统行业，对周边辐射作用不强。另外，服务业增长也不够稳定。2009 年，上海第三产业实现了约 14% 的增长，其中股市房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超过了 3%，但股市房市的波动性比较强，而上海的新兴服务业又没有形成，其高端服务业发展仅仅是单兵突进；其次，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是高新而不高端。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所占产值比例约 0.9%，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 1.5%，发达国家是 10%，这种局面导致上海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新技术产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比较低，全国企业的发明专利前十强企业，上海一个也没有，而深圳占了 6 个；再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失去了第一轮先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05 年以前，上海新能源汽车的研发重点放在氢动力上，但是制氢储氢技术难以解决，大规模产业化难以实现，而混合动力车、纯电动车的产业化，则比较简便易行，但在这方面上海已经远远落后于深圳。

四是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尚未形成，消费驱动模式需要转型。首先，消费受到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制约。分配格局不合理导致居民手中缺钱花。201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上海的 GDP 总量却排在全国倒数第三，尽管 2008 年上海的 GDP 总量超过了新加坡，2009 年又超过了中国香港，但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状况需要依靠提高工人工资来解决。其次，消费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善的制约。公共服务支出比较低，2009 年市本级财政的支出大概 12.3% 用于就业保障，而欧美一般是 30%~50%。上海用于经济发展、就业保障和民生方面的比重很低。再次，消费环境不佳，消费高端服务供给不足。上海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估计有 110 亿元，但只能满足 38%；上海的城市知识竞争力排名位列世界第 112 位。根据 2011 年 9 月 22 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 2010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统计数据，2010 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占上海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75%，远低于伦敦、纽约 18% 的水平，纽约、伦敦虽然是经济金融中心，但是文化产业的比重仍然很高，值得我们深思。

五是体制机制的约束日益趋紧，增量改革驱动模式难以持续。1978 年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增量改革的道路，随着改革的深入，传统体制对增量改革的牵制作用也逐步增强。从上海来看，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不持续既是我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固化的结果，更是关键领域改革开放没有到位，传统发展体制没有破除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一是服务业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服务经济发展的税制、管制、体制、法制的障碍尚未去除。

上海服务业实行的是全额征收营业税，制造业实行的是征收增值税，生产型服务业如果从制造业企业里面分离出来，就被征收高额的营业税，而金融业的税赋达到 60%，明显高于国外 18%~30% 的水平。这种状况不利于产业间的分离。二是，服务业的管制也明显较多。国家对银行、电信、保险、民航、铁路实行的是多头管制、重复管制和过度管制，大量服务产品的价格由政府制定。三是，服务业的法制不完善，许多新型服务的法律依然是空白（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四是创新体系的环境还没有形成，导致大量海外资本难以融入，同时科技成果转化难以实现。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孕育新产业的革命，对各个经济体制都是一次重新的洗牌。上海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有三大机遇已经初露端倪：

一是新一轮产业革命有利于上海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首先，新能源战略和智慧地球将引领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新技术战略，主攻方向就是 IT 和 ET，即能源技术和环境技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能源战略，计划今后十年投入 1 500 亿美元用于开发新能源和低碳技术。IBM 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把物联网和互联网深度融合。欧盟提出 2013 年前投资 32 亿欧元开发绿色技术。我国 2009—2010 年中央财预算安排资金 628 亿元，推动 11 个科技重大专项，包括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网、核心电子器件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其次，低碳产业和信息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国务院确立的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信息、新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海洋等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上海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

二是国内外经济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利于上海加快发展服务经济，抢占国际产业分工链的高端。首先，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召开不仅推动了旅游、会展、休闲、商贸的发展，而且推动了文化创意、专业服务、节能环保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迪斯尼项目的落户，也为全市的文化、娱乐、休闲业带来巨大商机。其次，全球金融贸易格局的重构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再次，全球的贸易格局正从传统依赖港口资源、以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为主要功能转向依赖贸易组织、市场体系、专业服务为主要功能。金融、物流、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快速增长，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加快升级，从而拉动对生产服务业的需求，这对上海发展金融、保险、研发服务和专利设计等业务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同时，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对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崛起，也是一个重大机遇，上海有可能因此成为

全球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

三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有利于上海争取更多的政策先行先试，突破体制发展的瓶颈，坚持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并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推进和“四个率先”目标的陆续实现将使跨国公司的研发设计、服务外包、功能机构和机构投资基金加速向上海集聚，外资转向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趋势将给上海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上海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将加速扩张，上海利用国内和海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开放时代正在来临。

三、华侨华人在上海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为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国家有关部门于 2009 年相继出台了《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支持办法（试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的意见》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教育部关于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相关问题的规定》等文件，2010 年，《全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颁布又为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资源大国转变进行了整体规划，是我国侨务工作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国际迁移对迁入国来说，人才流入几乎是无本万利的交易。从经济效益上看，人才流入可以增加劳动力资源，缓和劳动力不足，增加对商品的需求，由此产生了更有效率的经济效益；可以收到“智能效益”，节省培养人才的费用，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昂贵，而流入人口的素质越高收益越大。据统计，1950—1975 年，美国从发展中国家吸引的高级人才中所获得的价值为年平均 86 亿美元，比同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援总和还多，而联邦德国在 1957—1973 年期间，仅这方面的收益就高达 330 亿美元。^[6]与之相对应，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在中国商品出口和国际销售网的形成方面，在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也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见表 1）。

表 1 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估算

项目	1992—1997 累计	1998—2003 累计	2004—2009 累计
实际利用海外华商直接投资额 (亿美元)	1 180.76	1 677.74	2 647.03
实际利用海外华商直接投资额 (亿元人民币，按历年加权平均 汇率换算)	99 274.21	13 887.87	19 941.73

(续表)

项目	1992—1997 累计	1998—2003 累计	2004—2009 累计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 (亿 元人民币)	12 392.92	41 364.11	158 642.54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合 计 (亿元人民币)	21 667.13	55 251.98	178 584.27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合 计 GDP 比重 (%)	6.49	8.60	11.94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 额比重 (%)	20.46	30.13	34.10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占资本形成总 额比重 (%)	7.11	5.78	3.0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推算。^[2]

表 1 说明海外华商对华的直接投资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出口贸易增长效应。随着上海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农业及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和旅游等第三产业利用外资规模将逐步扩大，上述变化给包括华人资本在内的外资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华人资本必然会大量投资于上述产业，而华人企业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也将使上海的产业结构更为优化；华人华侨资本可以促进上海经济走向外向型道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其溢出效果明显。通过华侨华人的个人影响、海外华人传媒、华文教育以及华侨华人社团的民间形象，可以开展出境旅游作为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上海旅游业的国际化。

那么如何发挥华侨华人对上海经济转型的作用呢？这需要从侨群、侨区、侨资变化的新趋势中寻找发挥作用的新途径，并从政府内部消除妨碍引资引智的制度约束因素。应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

(一) 如何看待华侨华人对上海经济和金融中心建设所起的作用

华侨华人在上海利用外资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所发挥的先导、示范、联动和扩散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对华投资势头猛增，华侨华人投资来源地向拉丁美洲和非洲等新移民地区扩散。从外商投资的来源地来看，海外重点侨区是上海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最重要来源地，这间接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在上海引进外资中的重要地位。1998—2003 年，来自港澳台及海外重点侨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2 476.3 亿美元，占全部投资的 88.5%。值得注意的是，2003—2009 年与 1998—2003 年相比，除一些传统侨区的对华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外，一些新兴侨区的对华直接投资保持在一倍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来自越南、文莱、缅甸和柬埔寨四个新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增长最快，其他增长较大的有阿联酋、南非维尔京群岛与开曼群岛、新西兰、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有多个中国海外移民的聚居

区, 其对华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也反映了海外新移民的带动、扩散和联动效应。上海应从中看到新移民和新移民地所引发的新的投资趋势, 并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和大都市的“虹吸效应”, 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区和更有活力的人群, 通过内引外联, 建立新的引资渠道, 为新一轮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二) 如何看待华侨华人对上海贸易中心建设所起的作用

海外华侨华人对华直接投资和大陆新移民建立的全营销网络是上海出口贸易的两股重要推动力量, 而新移民则从小本经营的贸易批发和零售做起, 逐渐建立起上海劳动密集型小商品的全球销售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 出国经商的大陆新移民特别是沿海侨乡的新移民, 是上海商品出口的海外销售大军。据估算,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从中国大陆移出的新移民约 600 万, 约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 13%, 主要移入地包括北美、日本、澳洲、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俄罗斯; 主要移出地是福建、浙江、广东、上海和北京。新移民不仅改变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区域分布, 更重要的是为海外华侨华人的经营发展带来新的商机, 催生了众多为新移民提供服务的商业企业, 并形成了专门从事中国小商品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业务及专门提供移民、旅游服务的新移民群体, 在新移民群体中也崛起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企业和企业集团。新移民尽管集中于海外华侨华人的传统产业, 企业和投资规模小, 经营管理传统, 流动性大, 但由于他们与中国大陆企业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商业贸易联系, 成为推销中国产品和促进中国新移民居住国之间经贸关系的有生力量。上海不应该是归国华侨和华人的中转站, 更应该这个群体的贸易乐园和安居乐土。因此可以利用上海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契机, 完善为侨商服务的法律体系和人文环境, 尽快为侨商建立国际营销网络、资金网络、技术网络和合作关系网络, 从而以海纳百川的气魄, 激发物流、资金流和人才流快捷有效的运转。

(三) 如何看待华侨华人对扩大海外场所起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企业对东盟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阿联酋和东西欧地区等重点侨区的直接投资增长幅度远超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幅度。东盟国家作为华侨华人最重要的聚居区, 已成为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截至 2009 年末, 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企业近 2000 家, 在当地雇员 6 万人, 直接投资存量达 95.714 亿美元, 主要投向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电气水生产供应、

批发与零售、制造业、商务服务、采矿、建筑、运储、金融和农业等行业, 这些行业合计约占 2009 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 97%。

上述关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投向和来源分布说明, 海外重点侨区是吸引包括境内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企业、私营企业在内的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 港澳台商和海外华侨华人最早进入的中国东部沿海正在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 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商和国内企业之间正在进入双向乃至多向的互利互惠经贸关系发展新时代。基于上述事实, 在沪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充分考虑如何利用侨资和侨团打开国际市场, 拓展发展空间。

除上述作用外, 还应看到港台厂商、大陆厂商与其他海外华侨华人之间的合作对上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艺技术改进、国际销售网络及品牌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应看到北美留学归国人才在引进硅谷风险投资和企业运作模式及引进海外创新团队方面所起的作用; 应看到海外华侨华人在昆山的产业集群对上海 IT 及其相关产业研发、制造和服务一体化产业链形成所起的作用以及华侨华人跨国公司在大陆包括台湾、香港, 东南亚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区域性或全球性研发、制造与营销资源配置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四、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产业政策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加之欧美等发达国家近几年来面临的经济衰退, 北美、西欧等海外重要侨区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和投资方兴未艾潮。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产业结构再次升级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除了直接参与中国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创业、投资和创新活动之外, 海外华侨华人在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和风险资金中的中介和示范作用日益凸显。按照《全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所确立的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人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 需要我们走出传统的华侨华人政策的误区, 从全球化大背景和中国经济转型大视角和改革开放新局面以及华侨华人群体的新变化来重新反思国家和地方的侨务政策, 关注华侨华人对祖国经济发展的后续效应和祖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反馈效应, 立足上海经济结构现状及转型趋势, 突破地域限制, 营造良好的招才引智的制度环境, 使华侨华人能够招得来、留得住、住得久、能融入, 从而使上海成为广大华侨华人的第二个投资创业的故乡。

(一) 上海应积极拓展与浙江、福建和广东侨乡侨民的经济关系, 使其产业带延伸至上海。重点侨区是吸引包括境内港澳台企业和海外华侨华人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

(二) 充分发挥上海的区位优势, 以上海经济转型为契机, 以上海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重点, 引导华侨华人投资及产业结构实现调整, 推进上海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展。为此, 需要上海市侨务工作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促进本土企业与海外华裔的合资生产和合作经营, 以重点项目和重点地区为中心进行联合推介和引进, 聚集相关各方的优势资源, 以带动海内外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动和合作, 提高投资项目和地区的后续配套投资和后续效应。

(三)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改革创新思路, 开拓开放局面, 搭建贸易舞台, 延伸服务半径, 树立服务理念。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地不外乎海内与海外, 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走向无非是国内与国外, 现在侨务工作应立足于上海的“十二五”规划方向, 以人口跨国迁移的大视野, 在关注既有华侨华人群体的同时, 把目光投向大批的留学生、海外务工人员和其他类型的出国人员, 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华侨华人的新生代和潜力军, 是上海吸引外资和转型发展的储备库和后盾团。在利用海外华侨华人开展对外华侨华人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 随着国内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成本的提高, 相当一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需要转移到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通过与海外华侨华人建立合作关系有助于降低由于海外市场、劳动就业环境、政策法规的不了解造成对投资环境、合作伙伴、购并资产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对外投资与经营风险, 提高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质量和成功率,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少走弯路。

(四) 打文化牌, 摆时空阵, 利用“五缘文化说”, 整合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种关系, 发展非政府组织, 建立模块服务团队, 形成内外联动的大格局。打文化牌, 就是要强化公关外交意识, 把真心、诚心、热心和贴心放到第一位, 推动人事、社保、公安、外交、统战和工业等各个部门联手制定切实可行的移民政策, 为华侨华人在出入境、居留入籍、社会福利、子女教育、投资创业等方面开绿灯; 摆时空阵, 就是要以时间换空间, 增强侨务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以内外贸和投资出口为核心, 加快引进步伐, 拓宽辐射区域,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侨务格局, 使华侨华人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顿生“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之感。在具体操作上, 应利用上海和长三角区位优势, 立足浙闽粤等侨乡资源, 形成以港澳台为节点, 以东盟为跳板, 辐射美加澳的产业互动群, 构筑筹资、营销和创业三大板块。

(五) 在政府引导下, 广泛建立各级各类的华侨华人非政府组织和社团, 形成“以侨搭桥”、“借侨出海”的侨务工作新局面。目前, 上海民间的华侨华人非政府组织数量还不多, 以侨联为主开展工作, 这与我国开放现

状及上海经济转型所需的招商引资压力还不相称。上海侨联目前已经形成了四大组织: 一是以新归侨为主的市侨联青年委员会; 二是以侨资企业家为主题的市侨联华商联谊会; 三是以归侨侨眷企业家为主题的海外经济技术促进会; 四是由事业有成的侨界女性和知名人士的夫人组成的是侨联女侨联谊会。上海侨务工作可以通过联络、参与、引导和规范上述组织, 并积极鼓励成立面向海外的各种社会团体, 以民间机构多元化、地缘结构模块化为拓展思路, 建设以侨联为主体、涵盖各种国内外民间机构的广泛联系网和以上海—香港—新加坡—纽约等金融中心为节点的面向亚太的华侨华人筹资网络、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加工制造与营销网络及“以硅谷—台湾—北京—上海—苏州—东莞等创新城市为节点的全球华商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8], 推进中国的区域和产业经济发展, 提升中国企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六) 需要加强对相关国家涉侨政策的动态研究。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态度和政策直接影响到海外华侨华人的经营、投资和发展, 进而也影响到中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例如, 近些年来,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政府对华侨华人及其对华投资的态度和政策逐渐从负面或中性转向正面, 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而俄罗斯和西欧、东欧一些国家对新华侨华人的态度和政策却因各种原因正在从正面或中性转向负面, 新华侨华人传统的经营模式、过度的区域聚集和“灰色经营”, 加上经济不景气下当地企业和商人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混杂在一起, 影响到一些国家对新华侨华人的态度和政策导向, 进而阻碍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七) 应在国内设立半官方性质的专门服务于大陆新华侨华人海外投资经营的行业或专业协会, 指导海外贸易批发和零售网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为新华侨华人在海外的投资发展提供信息与法律咨询、政策和技术支持, 以利于大批中小规模的海外新华侨华人企业尽快实现经营转型和通过股份合作走上规模经营和联合经营, 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品牌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林其锁, 吕良弼. 五缘文化概论[M].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1版.
- [2] 巫乐华. 海外华侨·南洋篇[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年1月第1版.
- [3] 姬虹. 美国新移民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年8月第1版.
- [4] 潘光. 犹太人在亚洲: 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6月第1版.

- [5] 王家宝. 法国人口与社会[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 [6] 但伟. 偷渡犯罪比较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 [7] 徐军华. 非法移民的法律控制问题[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 [8]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 [9]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种族与历史 种族与文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 [10] 梁淑英. 国际难民法.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 [11] [英]罗斯玛丽·塞尔斯. 解析国际迁移和难民政策: 冲突和延续[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 [12] 朱国栋 刘红 陈志强. 上海移民[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
- [13] 周聿峨, 王显峰. 当代中国非法移民活动的特征——以福建沿海地区非法移民为例[J]. 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 2004(2).
- [14] 黄润龙. 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J]. 人口与经济, 2001(1).
- [15] 廖晓健. 华人政治地位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分层[J]. 东南亚研究, 2007(5).
- [16] 李其荣. 华人新移民研究评析[J]. 东南亚研究, 2007(5).
- [17] 周聿峨, 张树利. 新移民与美国华文教育[J]. 东南亚纵横, 2005(6).
- [18] 傅义强. 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述评[M]. 八桂侨刊, 2006(1).
- [19] 庄国土. 对近 20 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7(2).
- [20] 赵红英.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0(4).
- [21] 郭玉聪.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M]. 当代亚太, 2004(9).
- [22] 陈志强. 欧盟移民政治[M].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 [23] 刘国福. 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法律透视[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Rol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O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of Shanghai

CHEN Zhiqiang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201400,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conomic trait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overseas Chinese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nfronted by Shanghai in its economic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introducing foreign capita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he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proposal of exploiting Shanghai's location advantage to utilize the resourc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Zhejiang,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to develop NGOs, establish modularized service teams, forming industrial interaction groups covering the US, Canada and Australia, and take the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 a springboard to develop ties with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o form three new sectors of financing, marketing and innovating.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role

(责任编辑/韩狄明)